

# 贵州两个“高质量”释放新动能

新华社贵阳1月28日电(记者李黔渝、李凡)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4.5%，经济增速连续10年位居全国前列；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，192万人搬出大山……此间召开的贵州省“两会”上，“高质量”成为代表、委员关注的高频词，高质量脱贫和高质量发展正在黔贵大地加速释放新动能。

## 高质量脱贫：产业振兴强劲后劲

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是贵州最后脱贫的深度贫困县之一。板当镇同合村曾是当地深度贫困村，无产业、无人气，缺乏发展思路一度困扰村子。驻村第一书记罗乾介绍，近年来在脱贫攻坚推动下，同合村发展起140余亩林下养鸡和年产30万斤的特色冷水鱼养殖等产业，去年8月又投入300万元兴建起树屋民宿、亲子游乐园等乡村旅游项目。“村里产业逐渐有了生气，村集体经济账上还有50万元的净收入。”他说。

在脱贫攻坚冲刺阶段，贵州基层干部和4.5万名驻村干部冲锋在前主抓产业振兴，其中在易地扶贫搬迁点增强产业配套。完成192万人的壮阔迁徙后，贵州重点在安置区布局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以做好后续帮扶。目前，贵州已与相关政策银行签订协议，明确5年内累计投入信贷资金200亿元以上，其中配套产业投入将超过160亿元。

脱贫摘帽只是新生活、新奋斗的起点。贵州将通过持续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，加强传统村落和民族特色村寨保护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举措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。

## 高质量发展：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

两年前，贵州出台磷石膏“以渣定产”政策，磷石膏生产企业消纳磷石膏情况与磷肥、磷酸等产品生产挂钩，倒逼企业加快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。

贵州磷化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，该公司磷石膏总储量1.2亿吨，除了用于生产新型建材，还通过技术创新，将磷矿资源的回采率由50%左右提升至90%以上，有效避免采矿区地表塌陷问题，磷石膏正逐步“变废为宝”。

2020年，贵州首次实现磷石膏年度产销平衡，有效遏制了磷石膏堆存量增长势头，乌江、清水江等流域磷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。

铜仁市万山区在汞矿资源枯竭后，近年来利用老矿场打造“网红”生态公园，实现了从“卖资源”向“卖文化”的转变。此外，万山区还积极招商引资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，目前产值已经突破亿元大关。

数据显示，在绿色经济产业发展上，贵州生态利用型产业、循环高效型产业、低碳清洁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占GDP比重达42%，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20%，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贵州，绿色发展新动能正不断释放。

## “三大战略”持续加速

在贵州，一个个政用、商用、民用大数据应用的出现，驱动着贵州大数据发展“脱虚向实”。

贵州兴达兴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混凝土生产企业，自主研发了高性能混凝土大数据平台——“砼智造”，自动获取原材料、生产、运输等信息，在“云”端生成智能工艺数据包并连接生产线，解决了传统的建筑业效率低下、质量不稳定等“痛点”。

2016年，贵州获批建设全国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。截至目前，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全国第三；负责为苹果中国大陆2亿多用户提供运营服务；实施“万企融合”大行动，带动6043户企业开展融合，核心应用“上云”企业超过2万家。数字经济增速连续5年全国第一。

贵州省提出，坚持把高质量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，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，深入实施乡村振兴、大数据、大生态三大战略，让高质量发展跑出“加速度”。

## “前浪”引领“后浪”奔腾

# 浙江安吉“导师帮带”锤炼基层“新生代”

新华社杭州1月28日电(记者王俊禄、顾小立)干部“传帮带”开展群众工作，是我们党优良传统与优良作风的重要体现。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，创新设立的“导师帮带制”已运行16年，盘活了干部资源，构建起新老接续、充满活力的干部梯队。一批跟随“老把式”迅速成长的年轻“实干家”，成为基层工作传承薪火的人才保障。

### “三门干部”有了“入门导师”

脱下皮鞋西装，换上布鞋草帽；从带着“翻译”下乡，到学会山沟里的土话……在安吉，一批“出家门、入校门、进机关门”的“三门”年轻干部，在导师帮带下迅速蜕变，成为农村工作的“行家里手”。

为传承基层干部队伍中的优良作风和过硬本领，帮助年轻干部成长，从2005年开始，安吉将干部中的骨干与年轻干部结对，全面启动“导师帮带制”。16年间，这一举措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干部，结对形式也更加灵活。

安吉县杭垓镇地处浙皖交界，移民较多，方言有20多种，可谓“十里不同音”。镇党委曾对

全镇103名干部摸了个底，44名“85后”干部中，不会说杭垓方言的有30余人。为打通“语言关”，镇里开办“方言课堂”，邀请“老乡镇”一对多开展结对帮带。

杭垓镇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严牛牛老家在江苏淮安，语言不通成了工作“拦路虎”，有时甚至会错意，引起调解双方不满。“方言课堂”开课后，严牛牛得到了老干部廖洪权的帮带。廖老师还熬夜手写一本《方言注释》，给方言注拼音划重点，严牛牛如获至宝。半年后，严牛牛从听不懂到沟通无障碍，可以随意和村民拉家常，工作效率大为提升。

记者从最早探索“导师帮带制”的安吉县上墅乡了解到，帮带对象主要以参加工作不满三年、业务知识水平相对薄弱的年轻干部为主，选聘政治素质过硬、事业心责任感强、实践经验丰富、业务能力突出的个人作为导师，确定帮带关系进行“手把手”帮带。

### 让“书生气”化成“干事风”

“做好基层工作，嘴要甜、腿要勤、心要诚。”

老师褚雪松的话，上墅乡刘家塘村村委委员马晔时刻记在心头。获评浙江省“千名好支书”的上墅乡刘家塘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褚雪松，是一位有着20年基层工作经验的“老村干”，2018年起与马晔结成帮带对子，手把手带着小年轻融入基层。

马晔经常跟着老师下村。看到有些棘手的工作，总能通过心平气和的“闲聊”方式，赢得村民的理解配合，马晔暗暗佩服。

“和老百姓打交道，要无事常走动，有求尽力帮，讲话不空，说理不虚。”在老师的带领下，马晔渐渐琢磨透了乡村工作的方法，一点点把“书生气”转化成“干事风”。

黄杜村是安吉白茶的核心产区。初到村里担任第一书记，“85后”干部吴欣却对白茶和农活不太懂，和村民搭不上话。他挠着头找到黄杜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盛阿伟。

二话不说，盛老师手把手传授他白茶知识，带着他挨家查看茶叶生产加工情况。现在的吴欣谈起白茶头头是道，跟茶农的距离也拉近了。

### 从“传技能”到“明大道”

十多年来，安吉始终坚持惠民利民，不断推动“导师帮带制”走深走实。在实践中，聚焦干部“能说群众话”，结合“走村不漏户、户户见干部”“民情体验”等载体，坚持“用脚步丈量民情”，导师带领年轻干部走村入户，让他们进了门、坐得下来、说得上话、办得了事。

“‘导师帮带制’是抓手载体，更是方法理念。”湖州市委常委、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表示，导师们言传身教，不仅教年轻同志学技能、学方法，更让他们懂法规、明大道，促进年轻干部传承良好作风。

如今，“导师帮带制”已在湖州全市推开。“‘导师帮带制’强化政治引领，推动年轻干部补钙壮骨、固本培元。”湖州市委党校教育长沈佳文介绍，这几年，湖州每年有650余名35岁以下年轻干部发展为中共党员，其中80%以上都由导师担任入党介绍人。

# 星火，从此燎原

## 走进秋收起义会师地文家市

新华社长沙1月28日电(记者谭畅、刘良恒)甘厚美老人如今最喜欢的就是天气好的时候，坐着轮椅去秋收广场晒晒太阳，回忆往昔峥嵘岁月。

1927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市文家市镇大成村的他，与秋收起义“同龄”，从小就听村里老人讲述秋收起义的故事。

大寒时节，万物蛰藏，文家市镇的秋收广场愈显庄严肃穆。广场东南方，以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、万里长城、毛泽东诗词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为主要元素的“光辉起点”红旗雕塑异常醒目，展示着这个湘赣边乡镇的红色基因。

1927年，大革命宣告失败后，中共中央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，走上独立自主、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之路，并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江西四省发动秋收起义。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内的红军标语走廊上，一条条革命标语依稀可辨——“工农兵团结起来实行武装暴动”“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工人纠察队”“拥护中国共产党”“红军万岁”。这是秋收起义前后湘赣边界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的生动写照。

1927年9月9日，秋收起义爆发。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共5000余人分别从江西修水、安源、铜鼓起义，计划从三个方向合攻长沙城。

毛泽东在《西江月·秋收起义》中描述：“军叫工农革命，旗号镰刀斧头。匡庐一带不停留，要向潇湘直进。地主重重压迫，农民个个同仇。秋收时节暮云沉，霹雳一声暴动。”

然而，由于敌强我弱，各路起义进攻受



湖南省浏阳市文家市镇秋收广场的红旗雕塑(1月26日摄)。 新华社记者陈思汗摄

挫，起义部队人数锐减至1500余人。时任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当机立断，于9月17日命令各团向浏阳城东南的文家市集中。

9月19日，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，提出放弃进攻长沙，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。经过激烈讨

论，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，决定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。从此，中国革命踏上“农村包围城市、武装夺取政权”的道路，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燎原之势。

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，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

队，文家市会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。

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党组书记、文家市镇党委书记谢波表示，作为秋收起义会师地，文家市镇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，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幻，也度过了漫长的艰苦岁月。如今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，文家市老区群众正走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。“通过因户施策，积极发展产业扶贫项目，我们镇555户贫困户已稳定脱贫。”谢波说。

文家市镇是浏阳市首个财税收入过亿元的乡镇，但其下辖的岩前新村由于地处偏远，人均耕地面积少、林地开发率低，曾是省定贫困村。张运通更是村里最贫困的家庭之一，“最困难的时候，看病都没钱”。

2014年，张运通被纳入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。当地党委政府首先为他申请危房改造补助，建成新房。有养蜂经验的张运通还拿到了贴息贷款，逐步扩大养蜂规模，2015年顺利脱贫。如今，他已开上小轿车，家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从小接触红色文化，甘厚美1948年踏上革命道路。在解放战争九死一生的战火硝烟里，他立下一等功1次、二等功1次、三等功5次。退伍后，甘厚美扎根湘赣边，在文家市搬运队、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、文家市煤矿等基层单位默默奉献。

“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，很多老党员、老战士都牺牲了，绝不能忘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英勇贡献。”甘厚美时常教导儿子，要珍惜现在的好日子，不忘来时路。

# 火种，播撒信念

## 探访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

新华社昆明1月27日电(记者庞明广)与隔壁车水马龙的青年路不同，位于“春城”昆明市中心的节孝巷狭长而幽静，巷子里散布着几家小吃店、杂货店，烟火气十足。踏着青石板继续往前，一座青瓦白墙的云南传统小四合院静静地坐落在巷子深处，这里便是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。

9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云南的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诞生。

1926年11月7日，在夜幕的掩护下，共产党员李鑫、周宵、吴澄、黄丽生、杨静珊等人在位于节孝巷的周宵家，秘密召开第一次党员会议。

会上，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，正式成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，由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澄担任特支书记。

“这是云南的第一个党支部，标志着云南各族人民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踏上了崭新的革命征程。”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一级调研员陈祖英说。

1926年，正是大革命轰轰烈烈开展之时。北伐战争即将开始，云南督军唐继尧及其控制的滇军成为北伐后方的严重隐患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中共广东区委派遣滇籍共产党员李鑫回到云南，建立秘密的党组织。

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成立后，按照中共广东区委指示，积极开展推翻唐继尧反动统治的斗争。特支利用云南军阀之间的矛盾，成功促成云南四镇守使联合发难“倒唐”，于1927年2月6日将唐继尧赶下台。

军阀唐继尧的垮台，极大地鼓舞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斗争热情。在云南党组织的领导下，



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内景(1月22日摄)。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

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、农民运动、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，如汹涌澎湃的激流冲击着封建军阀的统治。党组织在云南得以迅速发展。到1928年底，云南全省党、团员人数增加到600多人。

然而，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，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，执掌云南政务的龙云秉承蒋介石反共旨意，开始大肆通缉逮捕共产党员。

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，王德三不为所动，在狱中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遗书。他在遗书中对父

亲说：“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，把身子献给人类了！”

“吴澄被捕时已怀孕数月，但她面对严刑拷打毫不屈服。”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编一处处长董杨说，“在牢狱里，吴澄还经常鼓励难友要积极斗争。她说，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活就是战斗的生活，不坐牢时搞革命，坐了牢还要搞革命。在这人间地狱里，更要以百倍勇气和敌人斗争。”

1931年12月31日，32岁的王德三、30岁的吴澄和24岁的李国柱壮烈牺牲。

光阴荏苒，岁月如梭。一位位革命先烈抛头颅、洒热血的云岭大地，如今已旧貌换新颜。2020年11月，云南最后9个贫困县宣告摘帽。至此，云南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，超过880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。一代代革命先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正成为现实。

“是先烈们的鲜血，换回了我们今天美好生活。”在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驻足参观良久后，昆明市民陶静动情地说。

1991年，经云南省委批准，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经陈列布展后对外开放，并成为云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并不宽敞的小院内，陈列着王德三、李鑫、李国柱、吴澄等革命先烈的塑像、照片，供后人来缅怀这段光荣而悲壮的革命历史。

“每年我们都要接待数万名参观者，党员们在小院里聆听先烈故事，重温入党誓词，许多人当场流下了泪水。”讲解员姚群说。

冬日暖阳下，为云南播下革命火种的节孝巷，宁静而温暖。